

●金恩辉

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之我见我思

ABSTRACT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ve a common nat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In April 1996, a conference on the arrangement of ancient books was held in Taiwan with participants from both sides.

KEY WORDS Mainland China Taiwan Arrangement and studies of ancient books

CLASS NUMBER G256.1

1996年4月下旬,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市“国家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举行。受该馆馆长兼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曾济群先生之邀,来自祖国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和图书馆界的学者27人和台湾学者二百多人共济一堂,共同探讨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华文化之根源、总流,其意义非同凡响。它标志着海峡两岸的交流在直接、双向的基础上,朝着新领域、深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两岸文教界的往来一直不断,如教育、科学、技术,乃至体育、演艺、影视、文物、书画、新闻、出版等各界的互访、互谈、互展、互演络绎不绝。此次我作为来自吉林省图书馆的与会者,与访问过祖国大陆的台湾朋友和同行及新老朋友们相会、重聚,可谓机会难得。会外参观,访问了10多所重要的文教单位,包括主要的高校、科研、文博机构及其图书馆(或图书馆学系、研究所)和公共图书馆,也有机会在台北市的街头巷尾同市民们攀谈……所见所闻,勾起万缕情思,印象十分深刻。

我们同台湾朋友在语言交流上息息相通。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多年来人际接触面较广,对各地方言的接受能力算是较强的,即使如此,每到南方一些省市办事,包括这次转机时在香港的几天停留,仍然深感语

言交流中的障碍。而在台湾,从餐厅的小姐到管理客房的先生,从大学的教授、学生、图书馆的同行,到书局、商店、摊床的经销者,都能用流利的“国语”(普通话)同我相沟通。一直负责安排我们日程的汉学研究中心资料组组长刘显叔先生,年纪与我相仿,他同我谈起中华古籍的辉煌和北京街头的风味小吃,以及到长城、颐和园、黄山、苏州园林旅游时的感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在言谈话语中不时流露出来的“北京味”,连我这个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四年的吉林人也望尘莫及。对于这种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有位和我同来台北的教授真诚地说:“咱们坐在这个会议厅里开学术讨论会,真的就像同样的会在北方某所大学里召开!”

台湾的文字也同大陆息息相通,只是仍用着繁体字,对我们这些赴会者并不陌生。共同的语言文字,表示着对本民族的文化积淀、传统文明、思维方式、人种素质等等的一致认同。我们在台北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文化的隔膜,人与人之间同祖同宗同文,两岸同胞通过语言、心灵与学术之交流,更加相互理解和接受,使彼此那种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更加紧密和浓厚。

如果说现代汉语、白话文未因两岸隔绝多年而仍然是大家通用的语言交际工具,显

示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那么,自清末民初,并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人使用的古代汉语、文言文,仍然成为两岸学者在耗竭心力地去发掘、整理、研讨的共同课题,这说明大家都确认这是同根同源,且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同一民族的事实。在短短3天的大会交流期间,我认真听取了30多位学者将其多年的研究成果浓缩成15分钟的发言,以及围绕着论题的自由提问与辩论,对每篇书面文章,我也忙里抽暇悉心过目。作者们或训诂、传注、疏证、集释、校勘、补正、辑佚、考证;或对某部国学经典钩沉发微、竭精殚智,以纵览今古、横较东西的气度,透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结构,追寻我们民族精神生命之源;或就本人及其周围的学者群数十年间古籍整理研究问题进行历史性回顾和前瞻性构画,……每位作者、每篇论文都将我带入一个广阔而深邃的领域,使我对作者的国学根底、他们非凡的智慧与才华、含辛茹苦的劳动油然而敬。我没有能力对这些成果的内容、价值一一论评,因为这批优秀成果只要集中起来,就是一部以宽广的文化视野与兼收并蓄的胸怀而构成的精品、巨著。

一个民族的古典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才识,传统文明;一代学者的治学精神与心态,折射着一个民族的理性之光、未来之路。炎黄子孙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对世代相传的古籍持续地进行整理、研究和传播。传统学术的积淀与发扬,还必须同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两岸古籍整理问题的这次合作,也为中华古籍的现代化利用奠定了契机。我感到在现代化技术应用方面,台湾同行们走在了前面。曾济群馆长的《国家图书馆发展自动化的现况》、台北市“故宫博物院”宋兆霖教授的《台湾地区所藏文献档案的自动化的探讨》、东吴大学中文系陈郁夫教授的《古籍数位化文献在学术研究上的应用》、台湾“中央研究院”李真德、陈弱水两位教授的《中研院史语所汉籍全文资料库介绍》

等,都为古代汉字信息的输入和识读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果。祖国大陆方面于80年代始,加强了古籍整理的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在18所重点大学设置古籍研究所,推出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培育了一批批专业人才。台湾方面老一代学者不乏大家,所藏文献独有特色,青年学生国文功底普遍较好,传统继承性也较强,但我认为还缺乏统一管理,多属个人钻研,古籍成果不够彰显,在传播与普及上比起大陆来,似较封闭。至于古籍文献资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以大陆为丰富,但台湾的文献价值也不容忽视,藏有许多大陆所缺的精品,今后两岸更需加强联系、互相合作,取长补短,联合起来,以期资源共享,这已为与会者所共识。事实上,近年来两岸学术界、出版界,亦包括古籍整理界通力合作而出精品的事例很多,最近大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台湾建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部《英汉多功能词典》就受到读者的好评欢迎。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和我联合主编,并由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近600万字的大型学术性工具书《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也是双方学者合作整理古籍文献的新成果。

岁月匆匆,转眼间结束台湾之行一年有余。每当回忆、反思这段经历,都使我想起英籍华裔女作家潘翎说过的一句话:中华民族有着鱼一样渊源回流的传统本能。古籍文献,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底和渊源。我在台湾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其重大而深远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民族回流传统本能的显示与发挥。此次去台,我们有幸见到了陈立夫先生,他以97岁高龄与会并致开幕词,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古籍正是我们祖先珍贵的文化遗产,属于每个中国人,不论我们身处何地,文化的根永远将我们连结在一起,古籍里的字句不断牵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这一硬朗有力的声音,出自经历了整整近一个世纪岁月沧桑的老人之口,使这次会议的精

●李久琦

披览前踪 鉴往开来

——读《中国图书馆年鉴》随笔

当我捧着刚刚问世的《中国图书馆年鉴》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下子买了10本,发给馆内各部门,让大家去看、去读、去学。

《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在全国广大图书馆人和有关读者的热切期盼中,在漫长的等待中,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无疑是图书馆界的一件喜事盛事。

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相继出版了1100多种各类年鉴。图书馆工作者整天摆弄图书,却见不到本行业的年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作为图书馆人心里难以平静。1986年,1990年,直到1994年经过三起两落后,才横下一条心,历时3年终于大器晚成,《中国图书馆年鉴》在世纪之交诞生了,可见其问世历程何等艰辛。

谁人不知,图书馆界办点事不易,当前又无“图书馆法”可依,《中国图书馆年鉴》的编撰,应属政府行为,学会行为,还是属于个人行为,谁也说不清楚。编不编,出不出全凭图书馆工作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哪个不知,当前出书一靠心血,二靠资金。正如年鉴的两位主编前言中所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版这样一部大部头工具书,是需要相当经费的。在国家和行业都不很富裕的今天,我们没有向国家和有关部门提出经费问题,可以说是

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这部年鉴方得以问世。”在经济急速转轨中,“白手起家”这个词,当今很少被提及,二位学者使用了它,这里透着无奈,透着酸楚。

多么可贵的知识分子,多么可敬的学者,他们的事业心何等执着,责任心何等强烈。试想如果有一闪念的动摇,其创意就可能付之东流,其出书又将成为第三次落地的泡影。但他们想到了数以万计的图书馆同仁,想到了数不清的读者正翘首以待,于是横下心来去拼去搏,说一万不如干一件,他们成功了。图书馆人将永远铭记那些为《中国图书馆年鉴》付出心血的有识之士,他们功不可没。

这部《中国图书馆年鉴》(1996)是建国以来首部图书馆专业年鉴。万事开头难,该年鉴时间跨度大,收录了1990~1995年间我国图书馆界的各种信息,分别由“特载”、“专文”、“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学教育”、“国际交流”、“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人物”、“法规文献”、“统计资料”、“大事记”、“名录”、“附录”及“索引”14部分组成。是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图书馆权威性工具书。它也是一种高密度、高容量、高效能的跨越6个年头纳汇百川的知识载体。其内容翔实,资料齐备,客观

神得到进一步升华。陈立夫先生的这种感悟,更值得我们悠悠地、永远地回味。

址:长春市新民大街12号吉林省图书馆,邮编130021。

金恩辉 吉林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通讯地

(来稿时间:1997.9.18。编发者:徐苇)